

新中国 70 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变革 与新时代系统动态均衡格局*

王曙光 王丹莉

[摘要] 新中国 70 年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均衡战略）”的历史演变，而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路径与中国经济从平等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历史性转变相匹配。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我国基本矛盾的重大变化意味着未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应更加关注系统动态平衡，鼓励东西部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势互补，并建立区域之间的战略合作联盟以及城乡之间的融合机制，从而实现中国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 新中国 70 年；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系统动态均衡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 (2019) —04—0005 (06)

[作者] 王曙光，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王丹莉，副研究员，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一、新中国前 30 年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1. 区域发展战略的含义和影响因素

区域发展战略，涉及到生产力在不同区域间的布局。生产力的地理布局对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和均衡化，既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顺利进行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生产力布局往往呈现出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演进路径，这个演进路径在不同国家不同工业化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一国生产力的地理布局受以下基本因素制约：（1）气候、地形、区位等自然地理条件；（2）资源禀赋差异，这些资源禀赋也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3）劳动力的区域分工差异，这影响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配置；（4）经济产业结构的历史传统，这构成一国生产力布局的路径依赖特征；（5）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的变迁，区域发展格局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1] 以上五个因素相互影响、动态融和，形成一种综合力量。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国根据各地区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差异特征、劳动力区域分工差异、经济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特征、社会政治文化的传统要素等条件，遵循一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目标是促进一个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由不平衡走向均衡。具体到中国，除了上面这些要素会影响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之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赶超战略、国家安全和战争因素、全球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影响也非常大。

2. 我国区域差距和不平衡问题的深刻历史根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不平衡、不充分”这一基本矛盾，其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就是一个重要的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18JZD029）。

我国经过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是非常严重的,大部分工业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少数大城市,而广大的内地地区和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差距甚大。中国的贫困人口也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生产力分布的地区差异过大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特征的出现,是中国近代以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早期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畸形的工业化模式本身造成了中国工业布局和经济地理布局的非均衡性。20世纪50~70年代末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出于对整个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考虑,深刻洞察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工业化模式的弊端,主张发展内地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中西部地区,加大对内地的生产力布局,努力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改变在工业化进程中过于倚重东部沿海少数工业城市的局面,从而实现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少不了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这是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指导思想。

3. 1949~1978年间从不平衡区域发展战略到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以及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旧中国形成的沿海和内地的不均衡特征,是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环境的必然结果。旧中国70%的工业位于沿海地区,新中国建立之后就要改变这样一个畸轻畸重的工业布局。1949~1979年30年间,中国重点发展内地,实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全国划分为沿海和内地两大经济地带,而侧重发展内地。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战备。实际上整个沿海地区,因为战备的需要,投资都相对不多,而把发展重点放在内地。1958年,中央设立七大“经济协作区”,^①建立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从国防需要出发,开始“三线建设”。^②内地投资占了大部分,尤其是三线地区。在工业布局方面,内地和沿海的差距大为缩小,每个地区都有几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崛起,成为遍布内地的重工业基地,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包括西安、重庆、成都、攀枝花、绵阳、昆明、柳州、贵阳、兰州、酒泉等,它们都是三线建设的重要产物,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工业基地,这是新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革命性变化。1979年以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强调区域平衡发展,重心在内地,极大地缩小了内地和沿海的差距。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到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新中国一开始就重视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因此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大面积的西部地区(含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民族和谐的状况也是前所未有。到了60年代(1964年开始),国家从战略和战备的角度,开始三线建设。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后,提出加强内地建设。8月,毛泽东在谈及工业布局时又强调,工业不可以集中在沿海地区,过度集中不利于备战,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必须加强二线三线的工业建设。^②这个决定对于人才的重新分布极为重要,西安、成都、兰州、昆明等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在60年代之后迅速发展起来。同时,毛泽东指示成昆、滇黔、川黔、湘黔铁路要抓紧修好,^③这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作用极大。

最近,经济史学家们对三线建设做了大量的研究。三线建设距离现在已经50余年了,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更加理性和客观。从战略层面和长时间视角来说,三线建设对于中国整体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尤其对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尽管三线建设时期从企业微观效率而言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可能不高,但是三线建设所形成的工业基础,包括当时从东部到西部迁过来的科学技术和科研机构,为中西部的的发展和工业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三线建设对于缩小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和东部的差距,对于中国区域间的均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成就,应该得到公正的客观的评价。

区域均衡战略对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和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三线建设还打通了中国西部的交通线,使西部的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铁路线就是三线建设的重要成果。三线建设是中国生产力向内地的一次大推移,是科学技术的一次大扩散,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工业项目,形成一批新的工业中心,如西南机械工业基地、华中机械工业基地、汉中工业区、关中工业区、天水工业区、银川工业区、西宁工业区、攀枝花大型钢铁基地、黔西大型煤炭电力基地等,对推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由于战备因素,沿海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某些项目上资金浪费比较严重,工业布局没有得到详密的科学论证,影响了企业效率。

^①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出台,明确提出“根据我国幅员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特点,进一步地在中央集中领导下,按照全面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将各省分别划入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大协作区。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301页。

^② 所谓“三线”,是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非边疆省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七个省区,以及豫西、鄂南、湘西、粤北、桂西北和晋西和冀西地区。这个三线是相对于一二线而言的。一线,指的是地处战略前沿的地区,三线就是全国的战略后方,二线指的是一、三线之间的地区。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大三线”,各省还有小三线。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历史经验和教训

1. 从均衡发展战略到不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向

改革开放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的区域发展战略，总体来说是从之前的平衡发展战略到不平衡发展战略的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就是强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激活经济，提高效率。这一时期，沿海的区位优势就发挥了出来，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获得了中央大量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导致中国沿海地区的突飞猛进。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直到1999年左右，国家的发展战略一直是以局部区域的优先发展战略为主，还难以充分考虑到东西部的均衡问题。其中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主要是追求GDP的总量增长，区域平衡是次要的，只有总量的快速增长，才能在动态当中解决全国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所以，这个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了更多国家投资的支持，西部的投资变得少了，尤其是原来大三线建设的区域，那些军事工业、国防工业等重工业的投资几乎全停顿了，逼迫这些三线企业要进行产业的民用化转型。有些三线企业成功实现了转型，如四川绵阳的军工企业成功转型成家电企业，长虹电视就是这么崛起的。当然，很多三线建设的成果在改革开放之后付诸东流，这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2. 非均衡的梯度开发战略的历史意义和教训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把东部的14个沿海城市定为开放城市，从北部的秦皇岛、大连，到烟台、青岛，最后到海口，成为第一批开放城市。国家的思路是先发展沿海，再开放中部和西部，这就是梯度开放和发展战略。这一梯度开发战略使东部的发展突飞猛进。同时，东部的开放和发展对于全国的开放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和溢出效应。梯度开发战略就是顺序开放策略，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思路。

应从两方面评价梯度开发战略：一方面，梯度开发战略确实搞活了经济，经济增长效果明显。梯度开发战略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是符合当时经济发展要求的。在梯度开发战略中，东部地区先行先试，探索新的经济模式和道路，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历史意义都应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要客观认识梯度开发战略所引发的消极后果。梯度开发的战略也为今天中西部的欠发达、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埋下了一个伏笔，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使东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加剧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西部的整体开发建设比东部大概晚了几十年，浪费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现在西部发展的滞后、中部的塌陷，其原因在于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中没有注意到区域的均衡发展，大量资金和人才跑到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导致区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很多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改革开放之后被东部沿海迅速拉开了距离，这是我们在这一阶段付出的历史代价。

1999年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离1979年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到了21世纪初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因为中部地区的发展明显滞后了，跟东部已经形成了发展的鸿沟，因此，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是造成中国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重新进行区域发展布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一系列决策，均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均衡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实现各区域的共同发展。

三、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调整与转型

1999年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出现了重要的调整和转型，即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全面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八五”计划开始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等，说明东中西部差距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2000年10月，“西部大开发”确立为国家战略，此后中央采取强有力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党的十六大（2002年）提出东北振兴。2009年以来，区域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的思路进一步清晰。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又开始强调区域均衡和协调发展战略？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了。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总量的增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不平衡的问题开始变得更加重要了。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全力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更加重视区域协调和均衡。2009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关

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等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系列规划。这些规划出台之密集,涵盖区域之广泛,区域融合之深度,都是以前的规划所没有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发展规划中,有些规划已经超越了一个区域的范围,开始强调跨省的协调发展,这就需要打破区域限制,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走向更深层面的区域融合和均衡发展。比如,关中和天水分属于陕西和甘肃,打通这两个区域,就要求两个省的通力合作。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也需要福建加强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作。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就需要将周边的几个省份联合起来发展。中部崛起,也需要豫鄂湘等地打破省级限制,建立大区域的概念。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将区域均衡发展与进一步扩大开放结合起来,北部湾的区域发展就要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开放,图们江区域的发展就要加强对东北亚的开放等。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均衡战略:深化区域协调发展

1. 新型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3+4”的总体格局

2012年之后,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可称之为“新均衡战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基本矛盾的变化之后,“不平衡”这个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国幅员辽阔,尤其是边疆地区极为广阔,如果生产力分布过于不均衡,确实是会引发大量的边疆稳定问题、民族矛盾问题、贫困问题,因此必须调整区域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地区实际上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尤其是资源、能源方面的支持,但是这些地区所分享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红利却相对较少,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了“3+4”的总体格局。“3”就是三个大的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4”就是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这四个战略。可以看出,整个区域发展格局既强调重点,又强调全国的均衡发展,尤其是要补好几个短板,比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以及中部崛起几个短板。但是补短板不是以牺牲东部地区为代价,而是要同时促进长江经济带和东部的率先发展。新均衡战略强调不断创新区域发展政策,深化各类区域合作,深化中国与国外的合作,实现中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使我国的新疆、广西、云南、宁夏、甘肃等内陆地区成为开放前沿,以对外开放促进改革发展的区域发展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选择,它突破了原有区域发展战略囿于国内市场的传统思路,实现了内外联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生产力,这个格局很大。

京津冀协同发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探索经济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发展的新模式,实现跨行政区的要素有序流动,有望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新的范本。未来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有实质性的推进,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后,首都的蓝天将更多,环境将更好,文化功能和对外交往的功能将更加突出,而河北和天津将承接北京疏导出的大量产业,形成新的增长极。习近平指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①

长江经济带要实现沿江11个省市联动发展,通过长江黄金水道串联起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渝经济区,有效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共抓生态环境大保护,加快统一市场建设,有力推动东中西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的计划将视野扩大到提升全球影响力和生态等领域,更加强调各地区之间的多方联动、良性互动。从政策手段来说,不光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而且要放开视野,把整个区域的比较优势进行综合利用,同时还要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均衡协调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

2. 党的十九大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方面的新进展

党的十九大赋予区域协调发展以更新的意义,要促进中国实现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最大限度消除区域之间不协调不均衡的情况。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都是反贫困任务最艰巨的地区尤其是一些成片的贫困区,如大别山区、四省藏区、^② 南疆四地州、^③ 大巴山区、云贵高原以及其他边疆地区,这些地区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将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要破除区域之间的割据,消除区域之间的行政割裂,如黄河沿线地区、长江沿线地区,要实现协调发展,就涉及利益平衡和生态补偿机制。

国家“十三五”规划又强调城市群的问题,中国将来要发展一大批城市群。如京津冀是一个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都

^①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 “四省藏区”包括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的77个县,全部是民族县,其中有69个牧业或半牧业县。

^③ “南疆四地州”包括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将形成一些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另外还包括东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在这些城市群中要实现资源共享、连片的开发和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发挥城市群中生产要素不断集聚的功能。

五、区域发展战略的未来趋势：新时代系统动态平衡发展格局

新中国70年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变迁，大概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均衡发展战略；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1999年之前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之后到现在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之后的新均衡战略。在这三个阶段中，实际上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平等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提出基本矛盾变化，“不平衡”的矛盾更加被重视，这时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国家的大战略是在继续保持经济发展效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公平问题，更加注重区域平衡。因此，从这70年的演变来看，区域发展战略的变化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取向的变迁是合拍的。

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要实现系统动态均衡发展，具体来说，要注意六个方面：

第一，区域均衡发展的“均衡”，不是静态的平衡，不是运用纯粹行政力量刻意造出来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要在东西部的动态发展过程实现平衡。^[4]要善于运用市场化的手段，促使各种要素在整个国家均衡地、自由地流动，既鼓励西部的人才和资源向东部流动，也鼓励东部的人才和资源向西部流动，其中资本的转移尤其重要。要利用政策引导，更多地将东部的资本引到西部去，到那里投资兴业，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要加强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给西部更多的倾斜性政策，使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理论构想，要兼顾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5]目前这个阶段，沿海要帮助内地发展，以实现更好的区域均衡。

第二，要以系统动态均衡的眼光看待东西部关系。要充分认识到，东西部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西部长期发展滞后，对东部的发展也会起到消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前30年，大量人才和资源从西部来到东部，丰富的人力资本的涌入，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但是最近二三十年，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之前的梯度效应已经开始减弱。东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已经引起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在影响着东部的发展。西部发展的滞后，降低了当地人民的有效需求，从而使东部地区的很多产品找不到市场。西部地区发展的滞后，使得优秀的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受到阻碍，没有人才的源源不断的涌入，东部的发展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必须深刻认识到东部和西部的依存关系，鼓励要素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鼓励东部向中西部的资本转移和人才转移，这方面的空间和潜力是非常大的。

第三，要在系统动态均衡理论框架下鼓励建立区域之间的战略合作联盟，实现跨区域的资源流动与资源整合。在东部和西部的省份之间，合作的空间很大，不同的地区要建立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战略合作关系，在教育、金融、制造业、技术合作、能源合作、环保产业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东西部各有比较优势，东部有技术、人才和资本优势，而西部有广阔的市场、有较为低成本的人力资本、有大量的投资空间。东部和西部的战略合作会得到双赢的结果。

第四，要在系统动态均衡原则下实行“多极化区域发展战略”，要鼓励打破区域界限和行政隔离，实现区域间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在中国广大的版图上，由于地理因素和经济社会因素，天然地形成若干跨省区的区域，这些区域是形成“多极化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各个区域之间，各个“极”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要素集散中心，相互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极其紧密，互促互融，一荣俱荣。因此，要构建区域性的核心，使得各种要素在区域（极）内部既有集聚效应，又有扩散效应。这几年，中央高瞻远瞩，建立了诸如海西经济规划区、京津冀经济规划区、辽宁沿海经济规划区、成渝经济规划区、广西北部湾经济规划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规划区、关中天水经济规划区等区域性的发展“极”，这些区域性的“极”的发展，对于缩小区域差距，对于激活区域内要素的流动，都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但在“多极发展的区域战略”中，关键的是要打破各个省区之间的诸侯割据，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区域壁垒，消除人为的行政隔离，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

第五，新时代实施新均衡战略的关键之一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区域发展差异（即东中西部发展之间的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即城乡之间人均收入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差异），而在这两大差异之间，城乡发展差异居于主要地位。实际上，虽然我国东中西部不同省份之间确实有差距，但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东中西部的核心城市之间（比如说省会城市和较大城市）差距不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关键还是城乡差距；即使在西部省份，大中城市和省会城市实际上都比较发达，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比较发达，然而乡村的发展却严重滞后。这就是“双重城乡二元结构”，即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既表现为整个国家意义上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又体现为每一个区域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而区域内的

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差异远远大于东中西部不同核心城市之间的差异。未来中国要以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开发战略为引领, 加快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 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 致力于改善农村居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网络的建立, 尤其是注重在边疆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推动反贫困战略, 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六, 互联网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极大地改变了区域发展格局, 为区域发展战略变革提供了技术基础。在新的信息科技条件下,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着一些新情况。资源禀赋的约束已经越来越小, 很多地方依靠新的信息技术, 克服了原来资源禀赋的约束, 实现了超常规发展。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就提示我们, 在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 要摆脱以往的传统思维, 解放思想, 打开格局, 依靠新的信息科技实现本区域的战略发展。而由于新技术的出现, 区域发展对空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小, 一些区位优势不佳的地区在新的互联网条件下很有可能获得超常规的发展, 开发那些原本难以发展的、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如, 浙江义乌的物流产业就是极为突出的例子, 义乌在完全不具备区位和人才优势的情况下, 成为世界物流中心。这都有可能引发区域发展格局的新突破, 而一些欠发达地区在新技术的支撑下, 后发优势明显, 完全可能后来居上, 比如贵阳的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发展十分迅猛。而产业的转型升级对区域平衡发展意义更加凸显, 如江浙一带的传统工业向西部和东北转移, 而江浙地区的产业实现了新的转型升级, 这种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区域转移, 将带来生产力布局的深刻变化, 要从政策和机制上鼓励这种转型和转移, 为生产要素更合理的配置提供制度支持, 为区域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 [1] 赵晓雷. 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 [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207.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五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391.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二十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26.
- [4] 王曙光. 中国论衡——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与新十大关系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5.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77-278.

China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ransition in 70 Years and New Era Systematic Dynamic Equilibrium Pattern

WANG Shu-guang¹ WANG Dan-li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New China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during 1949 ~ 2019 has experienced a deep transition of “equilibrium-disequilibrium-new equilibrium”. The transition is matched with the choice betwee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hanges of basic contradiction in China after 19th representative meeting of CCP signified that China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must select the systematic dynamic equilibrium pattern. In future, China should encourage free factor liquid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area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s advantage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truct the strategy cooperation union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70 years of New China;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strategy; disequilibrium development strategy; reg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systematic dynamic equilibrium pattern

责任编辑: 陈 明